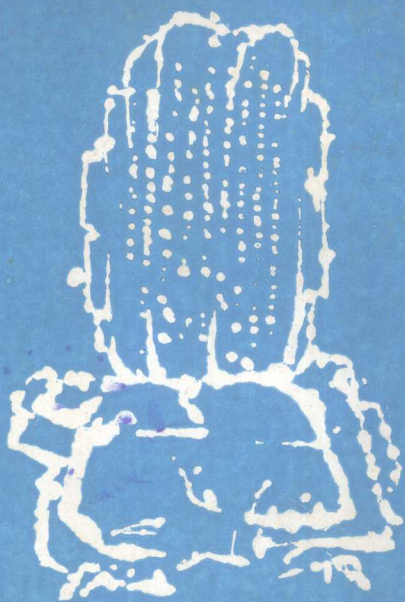


水浒传论说

杨仲义 著



说
解
其
中
味

中州古籍出版社

(豫)新登字05号

古典小说名著研赏

古典小说名著新论

古典小说名篇评品

水浒传论说

红楼梦导读

水 浒 传 论 说

杨 仲 义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罗山科技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6.75印张 160千字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ISBN7—5348—0693—3/I·274 定价: 4.00元

(98)		事英奇奇更美士人...	二
(98)		青龍杯...	二
(10)		而一令人...	四
(99)		...	二
(011)		...	六

目 录

创作主旨论说

杀尽奸邪始恨平.....	(2)
一、关于“逼上梁山”.....	(3)
二、关于种种“歌颂”.....	(8)
三、关于“招安”描写.....	(11)
四、关于义军“征辽”.....	(17)
五、关于宣扬“忠义”.....	(21)

结构艺术论说

千曲百回，巧妙有机.....	(38)
一、总体设计上的一线贯穿.....	(38)
二、故事衔接上的顶针勾连.....	(45)
三、单线推进中的巧妙穿插.....	(50)
四、情节发展中的曲折翻腾.....	(55)
五、关键时刻的故作险笔.....	(59)
六、千钧一发时的急事缓写.....	(64)

形象塑造论说

鲜明独特，千古若活.....	(72)
一 用传奇故事写传奇英雄.....	(72)

- 二、在风口浪尖上突现传奇英雄…………… (82)
- 三、状含神之形, 求形神酷肖…………… (86)
- 四、着力描写个性, 务使人各一面…………… (94)
- 五、在对比映衬中表现性格…………… (102)
- 六、立足现实人生, 不求“完全人格”…………… (110)

语言特色论说

谐于里耳, 浅处见才…………… (120)

- 一、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口语美…………… (121)
- 二、描述语言的准确性、形象美…………… (124)

著名章回赏析

《风雪山神庙》赏析…………… (134)

《说三阮撞筹》赏析…………… (139)

《智取生辰纲》赏析…………… (143)

《武松打虎》赏析…………… (147)

《寿张乔坐衙》赏析…………… (153)

《神聚蓼儿洼》赏析…………… (157)

研究资料选录

明清近代评论选录…………… (164)

平假野罪狀列

《對治本》王夫

內務部宣傳司主事

前「來」與世爭全正。自是而後。第一《對治本》王夫

然其書也。非不名之。小。一。典。古。書。其。目。下。非。無。其。耳。是。其。新

创作主旨论说

前「來」與世爭全正。自是而後。第一《對治本》王夫

然其書也。非不名之。小。一。典。古。書。其。目。下。非。無。其。耳。是。其。新

前「來」與世爭全正。自是而後。第一《對治本》王夫

然其書也。非不名之。小。一。典。古。書。其。目。下。非。無。其。耳。是。其。新

前「來」與世爭全正。自是而後。第一《對治本》王夫

然其書也。非不名之。小。一。典。古。書。其。目。下。非。無。其。耳。是。其。新

前「來」與世爭全正。自是而後。第一《對治本》王夫

然其書也。非不名之。小。一。典。古。書。其。目。下。非。無。其。耳。是。其。新

前「來」與世爭全正。自是而後。第一《對治本》王夫

然其書也。非不名之。小。一。典。古。書。其。目。下。非。無。其。耳。是。其。新

前「來」與世爭全正。自是而後。第一《對治本》王夫

然其書也。非不名之。小。一。典。古。書。其。目。下。非。無。其。耳。是。其。新

前「來」與世爭全正。自是而後。第一《對治本》王夫

然其書也。非不名之。小。一。典。古。書。其。目。下。非。無。其。耳。是。其。新

前「來」與世爭全正。自是而後。第一《對治本》王夫

然其書也。非不名之。小。一。典。古。書。其。目。下。非。無。其。耳。是。其。新

前「來」與世爭全正。自是而後。第一《對治本》王夫

然其書也。非不名之。小。一。典。古。書。其。目。下。非。無。其。耳。是。其。新

前「來」與世爭全正。自是而後。第一《對治本》王夫

然其書也。非不名之。小。一。典。古。書。其。目。下。非。無。其。耳。是。其。新

前「來」與世爭全正。自是而後。第一《對治本》王夫

然其書也。非不名之。小。一。典。古。書。其。目。下。非。無。其。耳。是。其。新

前「來」與世爭全正。自是而後。第一《對治本》王夫

然其書也。非不名之。小。一。典。古。書。其。目。下。非。無。其。耳。是。其。新

杀尽奸邪恨始平

——关于《水浒传》创作主旨的重新探讨

关于《水浒传》一书的创作主旨，五个多世纪以来，诸说纷呈，百家辩难，可以说是古典长篇小说名著中争吵得最热闹的。不过，择其要者而论之，明清两代主要是“忠义”、“海盗”二说并行，建国后主要是歌颂农民起义和宣扬投降两说之争。

持歌颂农民起义说的同志认为：《水浒传》是一部“歌颂农民起义”的“光辉杰作”。“全书巨大的历史主题，主要是通过对抗义英雄的歌颂和对他们斗争的描绘中具体表现出来的”。

持宣扬投降说的同志认为：《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有的甚至说它“反对农民起义”，“为叛徒唱赞歌”，“是为地主阶级而创作的”。

近年来又新起了一种为市民写心说，认为《水浒传》以市民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为主要人物，以市民群众为全书的基本群众，“展现了市民社会的广阔场景”，“表达了市井细民的憎私爱”。

这三种看法四十余年来几经较量，此消彼长。现在占统治地位的一般公认为是歌颂农民起义说了。个别人甚至认为《水浒传》歌颂农民起义已是不可动摇的定论，似乎有关《水浒传》一书的创作主旨以后永远也没有深究的必要了。其实，如果面对《水浒传》全书（而不是某一局部），人们并不难发现：《水浒传》既歌颂了梁山义军杀奸除霸、对抗

官府的正义行为，也颂扬了他们对另一支农民起义的反革命屠杀；既赞赏他们的勇敢反抗，也肯定了宋江等人的招安投降，又描写了招安后的功成被害；既描写了市民的生活和斗争，反映了市民的爱憎，更描写了其他阶级、阶层的生活和斗争，反映了广大“农夫”、“渔夫”的利益和愿望。无论是宣扬投降说，为市民写心说，还是歌颂农民起义说，都不能准确概括《水浒传》全书中这些丰富、复杂的思想内容，都不能给人一种左右皆宜、前后贯通的解释。这一点，连持歌颂农民起义说的同志也似乎有所觉察：“作者显然热爱义军，却安排这样一个宋江为领袖，从而又给义军寻求这样一条投降的死路，究竟为什么？真教人难解。”（吴组缃：《谈〈水浒〉》）这说明，四十多年来关于《水浒传》主旨的研究，并未取得一个切合《水浒传》作者立意和《水浒传》作品实际的结论。“翻旧案”也好，“炒冷饭”也好，重新探讨《水浒传》全书的创作主旨已是势在必行。

下面我们从五个角度来看。

一、关于“逼上梁山”

水泊梁山聚集着来自五湖四海的英雄好汉。人们习惯于用“逼上梁山”来概括他们的上山道路。其实，在一百八十个梁山头领中，真正称得上“逼上梁山”的只有林冲、鲁达、晁盖、吴用、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杨志、武松、花荣、宋江、史进、柴进、解珍、解宝十六个人。其他人则不是主动来投奔、入伙，就是被擒、被赚、被救上山的。这十六个人被“逼上梁山”的情况，大体可分为如下几种：

一是晁盖式的一“逼”即“上”。劫取生辰纲事发之后，晁盖、吴用、刘唐、三阮面对官府捕拿，当即商定：带

上“打劫得的金珠宝贝”，投奔梁山泊！花荣及解珍、解宝的被逼上梁山，情况与此大体相似。

二是林冲式的几“逼”方“上”。鲁达、史进、武松、林冲、柴进都属于这种情况，而以林冲最为典型。林冲原是京师有名的八十万禁军教头，享有优厚的待遇，又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小家庭，所以遇欺隐忍苟安，一向怯于反抗。但是，无耻狠毒的高俅父子自从岳庙调戏之后，贼心不死，接连逼害，先是企图诱骗强奸其妻，次又计赚林冲误入白虎节堂，进而想在野猪林暗害林冲，最后又派人赶来沧州牢城，要在“火烟堆里”断送林冲性命，终于逼得林冲反心萌发，手刃仇敌，夜奔梁山。

三是宋江的“逼”也不上，而又不得不“上”。宋江是一个出身地主家庭的县衙押司。“自幼曾攻经史”的封建教养，长期效力官府的政治生涯，使他滋长了浓厚的忠君思想。他怒杀阎婆惜后，受到滥官污吏的多次逼害，本来有很多次机会可以上梁山，但他却绕弯子，兜圈子，东奔西跑，硬是不肯上山，甚至还以死威胁抢他上山的晁盖等人：“这个不是你们弟兄抬举宋江，倒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万劫沉埋。”“如哥哥不肯放宋江下山，情愿只就兄长手里乞死。”直到浔阳楼酒醉吟反诗，被蔡九知府推上断头台，梁山好汉劫法场闹江州，闯下大祸，他自觉此次必不为朝廷所容，才“不由”不随大队人马上了梁山。对于《水浒传》作者把宋江塑造成这样一个忠孝双全，当反不反，硬是绕弯子兜圈子，迟迟不肯上梁山的形象，如果拘泥于歌颂农民起义说，那自然会觉得“难解”。事实上，作者的根本用意是在说明，宋江虽被奸臣恶吏诬为“贼首”，被宋朝皇帝视为“大寇”，其实却是一个大忠大孝、安分守己的人。但他却在家不为郓城县知县所容，到青州不为刘知寨、慕容知府所容，

到江州又不为蔡太师、蔡九知府及其帮凶黄文炳所容。他的最后不得不反，完全是被上自当朝太师，下至帮闲通叛这样一群奸臣恶吏连续不断的“缉捕”和越来越重的迫害逼出来的。精心设计宋江原本不肯上山的思想性格，生动记写他艰难曲折的“之”字形上山道路，就是为了在更广阔得多的范围内，多方面地揭露封建官府的罪恶行径和奸臣恶吏的丑恶嘴脸。

杨志被“逼上梁山”的情况与宋江类似。

总之，上述三种类型的“逼上梁山”，虽因各人的身份不同而难易有别，但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就是被逼者均为“义士”、“真人”，而逼人者都是赃官恶吏。这就是说，“官逼民反”在《水浒传》里并不是抽象的封建统治阶级逼得农民起来造反，而是十分具体的奸臣恶吏逼得一个个英雄好汉铤而走险。这些被“逼上梁山”的英雄好汉所深恶痛绝的，也是这大大小小的奸臣恶吏，而不是徽宗皇帝和大宋王朝。作者详细描写他们的被“逼上梁山”，正是为了揭露、谴责残民害人的奸臣恶吏，而根本没有比这更高的用意。关于这一点，全书一开始就曾给读者作过暗示。

《水浒传》本来是写天下大乱的，但“引首”却写了一段天下太平。人们对此往往不大注意。书中说太祖武德皇帝之所以能“扫清环宇，荡静中原”，使“天下从此定矣”，是因为宋太祖“乃是上界霹雳大仙下降”，是一个“英雄勇猛，智量宽洪”，“自古帝王都不及”的英明天子；仁宗时代之所以“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万民乐业，路不拾遗，户不夜闭”，是因为仁宗皇帝不仅是“上界赤脚大仙”，而且还有“玉帝差遣紫微宫中两座星辰，下来辅佐”。这种对“天下太平”缘由的解释，虽然给前代帝王和封建官僚披上了神圣的外衣，但那本意不但不是要把天下太平的原因神秘

化，反而恰恰是要告诉读者：天下太平的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君明臣贤。这就十分巧妙地暗示出，后来的人心思反，天下大乱，并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君不明，臣不贤。也就是说，“引首”的颂古是为了正文的非今。

所以紧接着，作者有意编造了一个“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的故事，把臣不贤具体落实到洪太尉头上，洪太尉禳灾的故事尚未讲完，又急忙用“高俅奸佞虽堪恨，洪信从今酿祸胎”的诗句，把高太尉拉上来同洪太尉相提并论。这用意无非是以洪射高，借谴责妄自胡为、生事惹事的洪太尉，来影射、谴责即将出场的高太尉。所以接下去便从虚到实，着笔高俅，先详细述说他的恶德丑行，暴发升迁，然后又用报复王进、逼害林冲、排挤杨志等一连串的故事情节，直接揭露他的恣意胡为，卑劣凶残。对于高俅的揭露、谴责，在《水浒传》中具有奠定全书基调，点明反奸责上主题的意义，所谓“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

除了上述十四个被奸臣恶吏逼上梁山的以外，与宋江同时或先后上梁山的还有秦明、黄信、燕顺、王英、郑天寿、吕方、郭盛、石勇、李俊、李立、穆弘、穆春、张横、张顺、童威、童猛、戴宗、李逵、侯健、欧鹏、蒋敬、马麟、陶宗旺等。从原来的出身、地位看，他们有的是兵马总管、都监、知寨、押牢节级、小牢子，有的是田户、富户、军户、车家、梢公，有的是裁缝、银匠、私盐贩子、生药贩子、水银贩子、羊马贩子、卖鱼牙子、卖膏药的，有的是闲汉、赌棍。他们的上山入伙，虽然看不出是遭受恶吏陷害，官府逼迫的。但是，作者写他们身处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恶浊环境之中，目睹奸臣恶吏为官贪滥，恣意害人，或是早已占山为王，与封建官府对抗；或是早就有了“不怕官司不怕天”的谋反念头；或是后悔为一面之词所迷惑，未能及早上山；

或是对奸臣恶吏的罪恶行径看在眼里，恨在心头。这就使他们的向往梁山、投降梁山、归顺梁山，也成了当时奸臣当道、恶吏横行、社会黑暗、人心思反的社会现实的反映，具有了揭露、批判奸臣恶吏的深刻内涵。

“必欲驱之尽入水泊，是谁之过欤？”这就是《水浒传》“逼上梁山”及其有关描写所要回答并已经明确回答了的问题。

当然，在我们今天看来，朝中权奸之所以能专权横行，肆意虐；赃官恶吏之所以能为非作歹，鱼肉人民，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皇帝宋徽宗的重用姑息，在于罪恶的封建制度本身。奸臣恶吏应该谴责，昏君徽宗应该打倒，封建制度应该推翻。但是，可惜这只是我们今人的思想观点。《水浒传》作者显然不是也不可能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写作《水浒传》。从书中一面揭露谴责奸臣恶吏和恶霸土豪“逼”得人民不得不反，一面又称道褒扬宿元景、张叔夜一类“好官”和赵员外、刘太公一类“好庄主”；一面用“细写端王本事，便见与高球合拍”，流露出对宋徽宗的埋怨和不满，一面又说宋徽宗是“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不把皇帝作为主要的谴责对象和打倒目标来看，《水浒传》作者显然只是一个奸臣误国论者。他既视奸臣恶吏为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说“奸邪坏国之端”，自然不可能“无恶不归朝廷”，更不可能准确揭示出北宋末年的阶级斗争和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而只能是无恶不归奸臣恶吏。这显然是一种历史的局限，但却是《水浒传》“逼上梁山”描写的实际，也是《水浒传》一书的主旨。也正因此，作者才在用大量“逼上梁山”的事实对奸臣恶吏进行直接揭露的同时，禁不住用饱含义愤的语言愤怒呼喊：“剥民官府过于贼”，“不顾民生与死邻”，“最恨奸谋欺白日”，“酷吏赃官都杀尽”！

二、关于种种“歌颂”

“歌颂梁山英雄”，对于《水浒传》来说似乎已成为一个难以否定的命题。但是，如果细读原书，人们并不难发现，《水浒传》对梁山英雄好汉的歌颂是有许多不同情况的。笼统地据以称之为“歌颂农民起义”，既不能全面反映书中种种歌颂的实际，更不能准确揭示这种种歌颂的实际内涵。

我们先看下面三种歌颂：

歌颂武松式的杀奸除霸。从书中的描写来看，武松的斗杀西门庆，刀刚潘金莲，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一是为了个人报仇出气，二是出于报恩思想。但是，他打击的主要对象毕竟是那些横行市井，残害无辜，上下勾结，恣意作恶的赃官恶吏和市井恶霸。他的复仇行动客观上反映了广大群众对奸邪恶暴的深刻仇恨，表达了广大人民惩恶除霸的强烈愿望。

歌颂鲁达式的仗义勇为。鲁达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先后“拳打镇关西”，“大闹桃花村”，“火烧瓦罐寺”，“大闹野猪林”，富有浓厚的侠义色彩。但是，由于作者有意把镇关西作为市井恶霸的典型来写，揭露其横行市井，强夺民女，诈人钱财，逼人死地；把高俅父子作为奸臣恶吏的典型来写，揭露其“倚势豪强，专一爱淫垢人家妻女”，陷害林冲，“要使英雄一命危”，从而使鲁达的嫉恶如仇，见义勇为，闪烁出了蔑视权奸，除暴安良的夺目光辉。

歌颂晁盖式的义取公盗。光天化日之下拦路抢劫，本是强盗行为。但是，大名府留守梁中书要“送上东京与他丈人蔡太师庆生辰”的“十万贯金珠宝贝”，却是从老百姓身上

“诈得”的。所以晁盖、吴用称它为“不义之财”，并在“黄泥冈上巧施功，劫取生辰不义财”。作者明确表示自己的观点：“取其非有官皆盗，损彼盈余盗是公。”

那么能否根据这三种歌颂得出《水浒传》歌颂农民起义的结论呢？显然不能。因为这时候的武松、鲁达以及杨雄、石秀等人既不是自觉走上反抗道路的起义者，更未成为梁山义军这个战斗集体的一员，而只是一些性格刚烈、嫉恶如仇江湖豪侠；晁盖等人也不是把智取生辰纲当作“聚义造反”的起点，要“揭开农民革命的序幕”，而只是出于对奸臣恶吏的不满和不义之财的义愤，所以事完之后便分了所得财物，各自回家受用去了。《水浒传》作者歌颂他们，主要是歌颂他们身上的抗暴除恶精神，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歌颂农民起义。

下面，我们再来看对他们上山以后的英雄行为的歌颂。这时候的梁山义军确实已经成为一支以农民为主要参加者，与封建官府相对抗的农民起义军。歌颂他们的英雄行为似乎很可以称之为歌颂农民起义。可是书中的实际描写却并不象人们想象、推理时来得那样简单。

就拿李逵来说，他嫉恶如仇，专一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作战勇敢，每次战斗时都是不顾性命，冲杀在前。还敢于在聚义厅前跳起来大喊：“放着我们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十分招人喜爱。但是，可惜的是，梁山“忠义堂”上并“不许”李逵“多嘴多舌”。《水浒传》作者给予李逵的也并不全是赞赏。当他手挥板斧，砍向赃官恶吏、恶霸土豪时，作者就赞扬，就歌颂；当他不但要“把那鸟官一发都砍

了”，而且扯诏书，打天使，骂皇帝，一再叫喊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时，作者便立即把他置于被嘲弄、被否定的地位，让宋江、戴宗等人训斥他“胡言乱语”，甚至要立即把他推出去“斩讫报来”。这种时褒时贬的态度有力地说明，《水浒传》是把对水浒英雄的歌颂严格控制在反对奸臣恶吏的圈圈之内的。它对水浒英雄个人反抗行为的正面歌颂只是为了突出全书反奸除霸的主观意图，而并没有其他比这更高的创作用意。

从第42回到71回，《水浒传》描写了梁山义军的发展壮大，热情歌颂了这个战斗集体的掠州劫县，对抗官府。但是，无论是攻打祝家庄、曾头市，还是攻打高唐州、青州、华州、大名府、东平府、东昌府，其目的都不在占州夺地，建立政权，而是为了惩恶救人，劫财夺粮，所以打了就跑，抢了就走。这种起义目的和起义方式，不要说大大有别于中国历史上实际存在过的大大小的农民起义，就是与《水浒传》书中的方腊起义，也迥然两样。关于方腊起义，书中写道：方腊原为“山中樵夫”，“起义已久”，“直弄到许大事业”，不仅占据“八州二十五县”，而且“自号为一国”，“改年建号”，“自为国主”。这显然与梁山义军的只反贪官，不建政权，啸聚山林，打家劫舍，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也正惟其如此，梁山义军才受到了充分肯定，热情歌颂，而方腊起义却遭到了口诛笔伐，斩尽杀绝。这种厚此薄彼、颂宋反方的鲜明对比，从正反两面说明了同一个问题：《水浒传》的创作主旨本来就不是什么歌颂或反对农民起义，而是揭露、谴责奸臣恶吏。它描写、歌颂梁山英雄的个人反抗和集体惩恶，是为了突出这个主旨；它反对、否定“谋判”朝廷，“自霸称尊”的方腊起义，也是受了这个主旨的制约。我们作为一个后世评论者，只宜实事

求是地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而不能用善良的主观愿望去臆断和拔高《水浒传》作者的创作主旨。

三、关于“招安”描写

如何看待《水浒传》中的招安描写，一直是《水浒传》研究中的关键，也是历来分歧最大的一个问题。持歌颂农民起义说的同志觉得它“教人难解”；持宣扬投降说的同志抓住它作为立论的根据；提出“两种水浒，两种主题”和“一本水浒，两个主题”的同志，也认为这部分是宣扬投降。而供大专院校学生使用的中国文学史教材则或者含糊其词，说作者对他所描写的义军受招安，一方面“完全是肯定的、赞扬的”，另一面“似乎又有所批判”（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或者用自己的主观揣测代替作者的创作立意，说“作者写了宋江的主张招安，也写了李逵等人的反对招安，并且把招安的结局写得十分凄惨。这未必不是施耐庵总结血的教训，指出招安的道路走不通”（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中国文学史纲要》）。

事情果真象人们所评论的那样吗？这得从第71回菊花会上的风波说起。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以后，宋江填词抒怀：“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立即遭到了武松、李逵、鲁智深等人的激烈反对。但当宋江一解释：“众兄弟听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竭力施功，有何不美？因此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意。”梁山所有头领便“众皆称谢不已”。一场十分激烈的招安和反招安的争吵很快就平息了。对于这场风波，不少评论者常常只是津津乐道这场

争吵的激烈，并由此得出梁山义军内部存在着招安与反招安、投降与反投降两条路线斗争的结论，而并不深究这场激烈争吵为什么能平息得这样快，或者只是用受义气蒙蔽进行一点儿皮毛的解释。其实，这里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什么义气蒙蔽，而是因为盼望招安，争取招安，虽然是具有浓厚忠君思想的宋江在大厅广众之中提出来的，但是，以接受招安，得个正果，为一生最好归宿，却并不只是宋江一人的思想，而是适应梁山义军几乎所有头领原来的思想基础的。大家知道，林冲、鲁智深、杨志、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三阮、武松、花荣、秦明、黄信、燕顺、王英、郑天寿、杨雄、石秀等，都是因为杀奸除霸，受到官府追捕，才到梁山“逃灾避难”的。其中武松还是梁山头领中最早流露接受招安想法的人。在菊花会上踢桌子、砸板凳，闹得最凶的李逵，不但灵魂深处存在着做官、发迹的旧意识，而且是宋江招安行动的自始至终的追随者。对此，宋江早在第55回就曾经作过一个总的说明：“某等众人无处容身，暂占水泊，权时避难”，“只待圣主宽恩，赦宥重罪，忘生保国，万死不辞”。至于那些被俘的官军将领，原来就是被宋江用“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的说教劝降的。他们的盼望赦罪招安，重返朝廷做官，更是性之必然，情之自然。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宋江之所以敢于在菊花会上当众大唱招安高调，并不是要冒梁山众头领之大黷，而是看准了梁山众头领的潜在心理，深知义军内部并不存在什么招安与反招安两条路线之争，自认为并不会遇到多大阻力。

再从梁山义军的行动纲领来看，还道村宋江遇九天玄女时，玄女娘娘告诫宋江：“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后来，“替天行道”的说教不仅多次见于宋江等人的言论中，书写在忠义堂前那面杏黄旗上，而且成